

文学经典是作家对于人生、社会、历史以及艺术最深刻的理解和体悟,而且经过时间的考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意义。选择经典,坚持经典阅读,是因为无数事实表明:经典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一文中这样说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阅读经典可能在短时期内不会取得迅速的回报和功利效应,但经典给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是一份对于人生最宝贵的投资。一个人能不能够在境界上真正有所飞跃,关键有二:一是能不能自主阅读和思考,二是读没读过经典。

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大学阶段,是一生当中最好的读书阶段,无论是做学问也好,还是将来从事其他工作也罢,在这一阶段接受的人文熏陶、读书所养成的知识素养和积淀,必将使一个人受益终生。我始终记得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教授当年为我们讲课时说过的话:“我上大学时读过的典籍,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富”。现在的大学生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生活丰富多彩,有很多种选择,看各种演出、打电脑游戏、上网聊QQ等,这都可以是年轻人的喜好。但除此之外,阅读经典这种文学教育和训练,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大学生必修的一课,这是一个年轻人整个人生不应该缺的一门课。时代、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现在的阅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也削弱了当下学生自主阅读的通道。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不但创作者本身容易在市场当中浮躁、迷失,读者也将面临更多诱惑,读图时代人们懒于阅读文字,也容易让现在的年轻人自动过滤、拒绝比较严肃高雅、思想深刻的作品,转而选择一些轻松的、娱乐性的文化快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郁达夫当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热爱读书是出了名的,因为喜欢德国文学,他每天出入图书馆读席勒、海涅、歌德等德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废寝忘食、读书不辍,常常坚持到图书馆的晚间闭馆。德国作家的作品读完了,就读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几乎每天要读完一部作品。要知道当时郁达夫是去日本学医的,文学只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他的专业。那个时代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一开始都是医科、理工科出身,并非是以文学为专业,但正是他们自身孜孜不倦的人文追求,才有了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改变国家命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之下,现在不要说许多理工科的学生基本上远离人文阅读,就是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阅读经典的热情也在下降。在教学中甚至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学生没有读过原著,但却能写出非常漂亮的评论,靠得就是网络资源的生拼硬凑。要知道,阅读经典原著是加强自身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刻,阅读不应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而应该成为每个人真正的需要和渴求。不读原著而“写”出的文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应该看到,现在信息传媒的发达

# 重视文学经典的阅读

□刘勇 张弛

便捷确实让一些学生形成了一种惰性,导致他们对文学经典人文价值的忽略,对实用性与功利性的过分推崇。一个大学生一个学期不怎么去图书馆不是什么新鲜事,学校的图书馆只有在期末考试之前或者是英语四六级考试之前才能坐满,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和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导致人文素养的欠缺。

经典作品一般有三个层面:首先是经典文本自身的文字、文体层面的独特价值;其次是经典的时代历史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良心;最后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还在于它能够超越具体时空,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但同时有一点需要注意,强调自主阅读经典,就在于不拘泥于课堂和教科书,要善于自我思考,提升怀疑的精神。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时间里历久弥新,不断产生新的价值,也正在于其文本的深刻性和开放性。

以鲁迅为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对于鲁迅的经典作品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其经典意义是在不同层面得到阐释的:我们通常在接触这部作品时的第一感触是,鲁迅在描写一个旧时代从物质到精神都一贫如洗的农民,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社会的最底层,他随时随地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欺压和凌辱,鲁迅对于这个人物是深怀同情的,所谓哀其不幸。而随着阅读思考的深入,就会发现鲁迅所写的阿Q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这个人物形象被赋予了鲁迅对于整个国民性的思考,鲁迅对这样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苟活麻木的国民灵魂代表,是有深刻批判的,所谓怒其不争,这一层次也

是一直以来从教科书到学术著作对于《阿Q正传》最普遍的阐释和解读。可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书本上的研究论述,结合我们的生存实际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会发现,这么多年来,《阿Q正传》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文本,这部作品在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并证明阿Q的经典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揭露,而是穿越了民族、国界,揭示了人性的共同特点,所谓“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如果说这部作品到今天还有魅力,那是因为在人性中体现的精神胜利法,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鲁迅作品里揭露的往往是人类的顽疾,这问题有强大的生存基础,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附在人类社会某种机制的温床上,寄生在人的头脑灵魂中,伴随着人类的集体而生。这最后一个层面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解读,有时候在课堂上就有学生提问,质疑国民性批判的解读模式,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是鲁迅那个时代国民的问题,平时就在我们身边,也不分民族不分国界地存在,并且还有留学生拿这个

小说和他们国家自己的小说进行比较,来阐释“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和思考。这就是很好的阅读经典的态度和方法,不是跟着权威的解读走,而是通过自己的自主阅读和现实思考,实现自己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反思,这样才能让在时间空间上似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文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和价值,经典意义的实现是和每个人的感知、共鸣度成正比的。因此可以说,经典并不神圣,是完全可以用每一个的阅读思考和人生体验去触摸它进入它的。

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因为他们自己是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对于文学作品有最直观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这些经典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有着自己独特深刻的认识,许多都是从文学经典本身出发,来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而在高校任教或在科研单位的学者,更多的是从国民教育、人文精神的培育方面出发,强调经典阅读对于国家、民族的社会意义,最近作家迟子建就提倡当下的年轻人应该多读一些经典书,少看商业炒作起来的畅销书,她强调经典阅读自身的自主性,是一个人个体的艺术鉴赏和精神、文化自觉,不应该受到来自外界特别是市场效应的干预和影响。而教育家朱永新多次撰文指出:不能片面地把阅读仅仅看成是一个个体的行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要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来认识阅读的问题。

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国家社会的角度,其背景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于经典阅读的重新推崇与提倡,一个国家的公民素养和人文精神是靠阅读来培育提升的。当前在大学里许多大学生也阅读,天天拿着手机在网上看东西,而且时下很多年轻人评价一个网络段子甚至是时髦用语便形容为“经典”,但这不是我们所要说的经典阅读。经典是具有一定范围和标准的,人类文明发展到如今,古今中外各种门类、学科、形式的经典浩如烟海,而一个人阅读的时间精力、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庄子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么这种有涯对于无涯、有限向着无限的追寻,都是通过书本这个媒介来进行的。这里的媒介也有区分,有的书本也只是满足你临时的实用目的,或者只是打发时间作为一时的消遣,那么这样的书本阅读所能够带来的只是一时的功用和快感,但是必不具备持续性和延展性。经典阅读不同,经典是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沉淀、各种文明成就的结晶,其本身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不断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所传播接受,并随着时代发展衍生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来,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对于这种经典的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或者短时间的功用消遣,而是能够使人在建立自

己的精神家园的同时,能够见识到自己的足迹不能企及的时空世界,是一种长期的知识提升、思想修炼,能够扩充人的眼界和认知,这是其他的书籍所不能够替代的。

大众传媒时代、特别是网络的发达,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新兴的电子阅读方式也在挑战传统的纸质媒介阅读,越来越多的人在用手机、移动电脑阅读,我们查找资料更加方便,获取资讯更加迅捷;同时网络的信息、文学也逐渐成为阅读的内容,博客、微博以及各大网络论坛的写手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包括各种演义、戏说历史和穿越、玄幻小说在内的网络作品,其知名度和受众甚至超过了我们平日里所熟知的严肃作家和作品,可以说从传播形式到实际内容,人们的阅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日趋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这样的变化具有其合理性,至少为人们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丰富色彩和便捷。

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仅仅是讯息的传播远远不是阅读的全部,而网络文学、畅销文学也不能代表当下文学最高的水平和作家最精致的追求。在大众传媒时代,博客、微博以及相应的网络文学网站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写作的准入标准,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有一个平等的、开放的空间进行创作并与人交流,同时也有了不少的作品出现;但是这个开放空间当中文学创作、发表准入标准的降低,也使得这个平台上呈现出来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思想意蕴的追求、对于文字表达的打磨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精益求精,往往浮躁于时效性和轰动性。当前我们看到的许多流行的网络语言、畅销作品,甚至是一些带有低级趣味、比较恶俗的文字,在一时间可能非常火爆,但那只是迎合大众在网络狂欢中的发泄心理,其本身更多是作为一种商品来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

我过去也曾经在文章里讲过:文学经典应该是让人们通过阅读主动对于文学审美和思想意蕴的趋近,而非是让文学创作对于大众、市场的趋同。文学经典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它可以通过市场、传媒来运作和传播,但不能完全依附于外界的市场传媒。

鲁迅早年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和许寿裳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但是因为经费问题没有成功,后来和周作人一起在《河南》杂志上撰稿,包括《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在内,鲁迅前期的几篇重要文章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后来鲁迅他们致力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的思想雏形,但是这本刊物也因为外界现实的各种原因只办了10期再没有办下去。那个时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言情文学、黑幕小说大行其道,非常受读者的欢迎和市场的追捧,试想以鲁

迅的才华,写写迎合大众的小说、时文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恰恰是因为鲁迅等人的固执和坚持,才有后来五四时期的《呐喊》《彷徨》以及后期鲁迅创作的诸多杂文那样的文学经典出现。有太多的现实考虑,而忽略对于文学审美和独立精神的追求,是写不出伟大的文学经典的。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生孤独的,但是惟有这样才会呈现生活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这些经典就如同作家燃烧自己,在人类历史茫茫黑夜里发出的光、传播的热,这是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媒介如何变迁都不会泯灭的,我们很难想象现代的中国没有鲁迅会是什么样子,就像英国没有狄更斯、法国没有雨果、俄罗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里,各个高校、图书馆、媒体出版社举办的读书会、文化沙龙,这些已经初具规模,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就像大学的文学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一样,一个社会里民众经典阅读习惯的养成,也不能只靠举办几个读书节、读书日来实现,归根到底要激发每个人自主阅读的欲求。近来有人呼吁要建立“国家阅读节”,或者是定在孔子诞辰这一天,或者是和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合二为一,通过这一个节日的设立来促进国民的阅读。我想说的是:正如打假不能只靠“3·15”一样,推动当下国民以及大学生的阅读,是不能只靠设立几个读书日、读书节来解决问题的。

其实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全民阅读,1997年美国政府掀起了一场“阅读挑战行动”,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亲自作为了“美国阅读挑战行动报告”。布什政府在2001年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议案,指出“美国存在两个民族:一个能阅读,另一个不能”。日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将2000年确定为“学生读书年”,2001年制定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明确了国家、地区和公共团体在读书活动中的责任。历任德国总统都担任“国民阅读促进委员会”的主席,其国民每4人中就有1人藏书200至500本,超过40%的德国家庭拥有“家庭图书馆”。

我们经常说俄罗斯是一个阅读的国家和民族,俄罗斯从国家政府到社会机构,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制定各类文件、出台多种措施来促进民众阅读。但是这不是俄罗斯民族成为阅读的民族的关键。我曾去过俄罗斯进行文化考察,从摆地摊的小贩,到普通的义工导游,每当和他们谈起普希金、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的时候,他们发自内心所表现出的兴奋和敬仰之情,实在令人难忘。俄罗斯这种文化氛围,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普通民众对于阅读的自觉与渴求,特别是对文学经典的推崇,是遗传渗透到他们民族每个个体的文化基因里的。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大学文学教育应该注重的问题,不要把阅读当成一个机械的工程或者是可以计算的任务来做,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个体形成自主阅读的习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推进经典阅读和文学教育的关键。

# 从文学研究到人学建构

□林同华

人学研究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美学家祁志祥教授从文学研究转入人学研究是其思想的必然发展。经过多年的钻研,祁志祥完成了《人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展读一过,心灵为之震撼。

“人学”的概念早已有之。不过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有人就因为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清除了笼罩在“人学”身上的种种迷雾,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历史反思,呼唤人、聚焦人、认识人的“人学”大讨论及其研究学科、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198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人的研究到人学》一文。1990年,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主编的《人学词典》出版。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央党校等高校相继开设“人学”课程,一些省市也先后成立人学研究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人文学会于1996年5月宣告成立。嗣后,一些探讨人学原理与人学思想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如1997年,铁源编著的《人学》出版;2005年,黄楠森担任总主编的“人学”的理论与历史”三卷本丛书出版,分别是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赵敦华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李中华主编的《中国人文思想史》。我们一方面为“人学”研究的解禁拍手叫好,另一方面也为“人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感到遗憾。我们发现,许多打着

“人学”旗号的研究还残留着明显的政治禁忌和左倾色彩,并且在知识结构上存在陈旧、狭隘的局限,这就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流于“人学”之名而无“人学”之实;同时由于这些论著多出于众人合作,逻辑的统一性、思辨的严密性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相比之下,祁志祥的《人学原理》就避免了上述不足,给人强烈的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探讨的“人学”,是由“人性论”及其辐射开去的“人生论”、“人治论”、“人格论”、“社会论”五大部分思想组成的范畴体系;作者探讨人学的基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方法;作者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是中外古今关于“人”的思想资料和事实案例。全书分“人性论”、“人生观”、“人治观”、“人格观”、“社会观”五编,下设几个到十几、二十个不同章节,展示了对人学学科的丰富、全面的思考和建构。虽然体系庞大、涉猎极广,但完全出自作者一人之手,移步换景,相互照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体现了高度的有机性和强大的思辨力量,堪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学”学科诞生的奠基石。

虽然本书五编具体论析的人学问题多达51个,但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作者宝贵的材料积累和独特的思辨创见。比如关于人的根本特性,学界过去流行着一种成见,以为西方古希腊哲学的观点是“理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仁义”。作

者列举大量材料说明:中国古代的“仁义”特性说是建立在“理智”特性说基础上的。如孔子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孟子说:“心之官则思。”王充指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徐干指出:“天地之间,含气而生者,莫知(智)乎人。”《列子》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唐末无能子指出:“裸虫中繁其智虑者,其名曰人。”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在体认人的理智特性方面,中西方思想家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第一编第四章)并指出:人的根本特性是理智,而不是仁义、劳动、文化和社会性;人的仁义特性、劳动特性、文化特性、社会特性都是建立在理智特性本根之上、由理智特性派生出去的亚特性。又如关于中外“民主”内涵异同和利弊的比较阐释,作者通过详实的论证揭示:中国古代“民主”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指“民之主宰”,从西方翻译进来的现代“民主”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复合词,指人民自己给自己做主。中国古代的“民主”多由“民之君主”充当,表现为“民之君主”代民做主。“民之君主”之所以代民做主,是因为在古人看来“民者瞑也”(董仲舒),普通民众是没有觉悟的群氓,目光短浅,惟利是图,往往不能给自己作出正确的自由抉择,必须依靠一位品德高尚、头脑聪明的圣人为他们做主。这一方面导致了君主专制的诞生,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君主要像“民之父母”一样“爱民如子”,负有养民教民的责任。这是中国古代“民主”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肯定民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人们只看到它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它的坏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民主”发生论有先见之明和弥补之功。同时还要看到,现代“民主”的“民”是指每一个个体的国民,事事靠全民公决式的“直接

民主”决策是行不通的,所以“民主”的常见形态是通过议员、人大代表代为传达民意的“间接民主”。当议员、人大代表不能充分集中和传达民意时,“民主”就剩下空壳子,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屡屡发生过。因此,也不要过分抬高现代“民主”(第三编第六章)。诸如此类的研判发明、补苴罅漏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开人心智,沁人心扉。正如有人所称道的:“思理之密、材料之富、论析之精,令人叫绝。”“一部厚重灵动的书!一部不枉一读的书!”斯言不虚。

“人学原理”是一个哲学题目,不过却出自一位原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之手。这是怎么回事呢?作者原来事从徐中玉治中国古代文论、文论界有一句名言“文学是人学”。要把文学的事情说清楚,不研究人学是不行的。后来作者转入与文艺理论交叉的美学研究。美学界有人提出一个是非非的命题:“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化。”“美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于是作者在研究文学、美学的同时,始终关注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人有关的思想资料。在材料的收集、思考过程中作者发现,人们思考人性、人的本质问题,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的——指向人生,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人生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指导;指向人治,为人的治理提供人性依据;指向人格修养,告诉人们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指向社会理想,启发人们认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更加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由此形成了对“人学”的独到理解。以这种理解梳理中国思想史,作者以一人之力分别于2002年、2006年出版了近47万字的《中国人文史》古代部分和26万字的《中国现当代人学史》,为从逻辑上纵论古今、兼顾中外、横向建构《人学原理》提供了资料上的保障。

本报讯 6月18日,来自武汉的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亮相南锣鼓巷戏剧节。该剧改编自作家方方的小说《树树皆秋色》,至今已在上海、贵阳等地上演150多场。话剧围绕着“三个人和一个声音”展开,讲述了知名大学的美女教授与一个神秘电话之间孤独而诡秘的故事。

华蓉、梅莞和王志强是大学同窗。毕业后,三人留校任教,王志强和梅莞结婚。有一天,仍然单身的华蓉莫名其妙搬到对门,前者的幸福被打破。正当梅莞为华蓉四处寻觅男友的时候,华蓉却与一位自称“老五”的“学生”坠入爱河。情浓之时,“老五”突然失踪,且学校“查无此人”……

据说,这是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作品。该剧深深刺入了人类内心中最孤独脆弱的一片区域,处处流露出情感交流的疏离感以及对于真实交流的怀疑和恐惧。该剧把关注点放在了当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情感世界上,揭示了其精神绿洲化和内心荒漠化的极大反差。

(欣闻)

## 四川召开中国现代诗研讨会

本报讯 作家李习文出版了诗集《归来吧!我的诗神》,在书中附录的《学诗札记》中宣示了诗歌主张,“提倡通俗诗,反对广大读者看不懂的怪诗”。这引起了四川诗界对现代诗的热议。日前,“中国现代诗创作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与会者对中国现代诗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坦诚的研讨,并着重谈了“怪诗”问题。与会者指出,“怪诗”故作高深,无病呻吟,远离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形成一种不良诗风,这种现象“像一堵墙横亘在诗歌发展的路上,现在是到了拆掉它的时候了”。

与会者对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大家认为,现代诗在艺术的表现上有不少成功经验。

如“在古典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就是其中之一。当下现代诗存在的诸多问题是诗歌发展进程中的曲折。只要诗歌界正视问题,认真思考和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回归诗歌优秀传统,回归人民群众,回归民族土壤,中国诗歌的振兴是指日可待的。

(茹春)

## 首届全民国防知识大赛《我爱国防》启动

本报讯 6月22日,首届全民国防知识大赛《我爱国防》在京启动。该节目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和中国航天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并得到了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的指导。节目将借鉴流行的益智类节目的表现样式,突出选手参与的广泛度、内容涵盖的丰富性、赛制设计的悬念化和节目的时尚感。大赛将以《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等国防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将国防历史、军事知识、武器装备、防务热点等融入其中,从全国选出48名选手进京参赛,再经过7轮角逐,最终选拔出一名全民“国防之星”。《我爱国防》将于今年9月“全民国防教育日”之际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黄金时间播出。

(王见)

## 《晚清帝国风云》在京首发

本报讯 6月23日,关河五十州《晚清帝国风云》新书发布暨签售会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活动中,作者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缘起和心得体会,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勤,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曾著有《一寸河山一寸血》等作品。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近期出版的《晚清帝国风云》由关河五

州历时5年创作而成。作者从道光皇帝登基开始,写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将晚清的这一段历史娓娓道来,还原呈现了其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关河五十州表示,自己在阅读了大量史料之后,才发现晚清这段历史中有许多人们并不了解的真相。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来复原历史的真实,并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给中国近代历史带来的影响。

(王见)

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亮相北京